

中國現代「性」與華文女同志系譜： 評桑梓蘭《乍現的女同志： 女子同性情慾在現代中國》

朱 偉 誠*

書 名：*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作 者：Tze-lan D. Sang

出版時地：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頁 次：xii + 380 頁

一、中國的現代「性」計畫¹

中國的現代「性」究竟若何？這無疑是個饒富興味的課題，也是桑梓

*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1 現代「性」這個一語雙關只限中文，指的是一般所說的「現代性(modernity)」以及「現代的性/性相(modern sex/uality)」；「計畫」(project)一詞則取自哈伯瑪斯有關現代性的著名文章標題：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 Bay Press, 1983), pp. 3-15.

蘭 (Tze-lan D. Sang) 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專著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我姑譯為《乍現的女同志：女子同性情慾在現代中國》，以下簡稱「桑著」) 所突顯的核心關切所在。桑書一開始就以幾幀出現於民國初年 (1914 年) 某一中規中矩的文學雜誌 (《眉語》，上海出版) 上的女子「親密」影像，以及隨後出現的月份牌廣告畫，² 來突顯中國現代性 (Chinese modernity) 所帶來的、在「性相 (sexuality)」方面的「知識系統 (epistemic)」斷裂，可以說是具有高度的啓發性：因為那些在如今無疑會被解讀為充滿女同志意含的女子親暱姿態照片，在出現當時顯然是並不具有這方面的意含的。在 20 世紀初與世紀末這兩個時間點之間，華文世界顯然改變了很多，因為類似的同性身體動作，出現在台灣九〇年代的同志雜誌《土狗》、《G & L 熱愛雜誌》以及《愛報》之中，卻不證自明地代表著，或者我們應該說必然會被解讀為，女同志情慾的表徵。³

顯然是人們看待事物的觀點變得不一樣了，而包括女子同性情慾在內的「性」，無疑是這個重大變化 (或可統稱為「現代化」) 的其中一部分，但卻是之前相關討論中通常被忽略的面向。但正如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的、中國「現代性」中「性別」面向 (主要關於女性解放的議題) 的豐富研究成果顯示，這整個「計畫」 (即「現代性」) 在一個多世紀前的中國開展以來的千頭萬緒，環環相扣，其實還有許多為我們今日尚待掌握之處，而「性相 (sexuality)」方面的變化不僅不能偏廢，也往往是許多重要關節之理解關鍵所在。⁴

2 Tze-lan D.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3, 18-19. 以下引用時簡寫為 *EL*。

3 *EL*, pp. 4-5, 55-57.

4 彭小妍就說：「由於五四研究一直偏重於以民主、科學救國的迷思，這個事實便被忽略了。筆者要指出的事實是，民主、科學的關懷可能屬於五四精英文化 (élite culture) 的層面，而一般多數民眾真正關心的多半是家庭、婚姻、愛情等問題，因為這才是個人能切身體驗到的。五四時有關性教育、愛情婚姻和優生學的刊物不勝其數，足以反映這一事實。」見彭小妍，〈性啟蒙與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張競生與五四的色慾小說〉，《超越寫實》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頁 117-37 (頁 122；黑體後加)。但我以為這種忽略偏重，問題主要還是出在後來的研究取

桑著以（女子）同性情慾為關注焦點，對於這個面向的脈絡追索有了一定的成績。「同性愛」這個日本漢譯名詞，以及隨後變異而成的「同性戀愛」與「同性戀」在現代中文的出現以及適用，⁵ 所代表的其實是中國1910與20年代（有時透過日本的）對於西方性學（sexology）的注意以及引進，當時著名的性學家，如 Havelock Ellis、Iwan Bloch、Richard von Krafft-Ebing、Sigmund Freud、Edward Carpenter 等人的相關學說都有介紹討論甚或作品直接翻譯，Magnus Hirschfeld 本人甚至來中國訪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⁶ 而由這個新的知識風潮所引發的有關情愛與性的一般討論（其實是以異性關係為主），更是充斥於當時的知識刊物與出版之中，作為現代中國整體性別與性相革命（在心態上則是啓蒙）的重要癥象。桑著由於焦點集中在（女）同性情慾，⁷ 對於這個大圖像未及有仔細的描述，但確乎指出了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主要便是在現代中國，似乎也發生了如傅柯在《性相史·第一冊》中所描述的，一套以「性相」概念為主要代表的、新而且更細膩深入的個人管制「權力機制（technology of power）」的出現。⁸

桑著僅簡短觸及這個頗為重要的歷史命題，⁹ 因為全書真正在意的，其實是這套性相機制與新的性別機制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導論中即已明說對於「性別分析（gender analysis）」的堅持），¹⁰ 所以書中反覆陳述的，其實是她對於「女子同性情慾」這個新概念出現之後，所引發「前所未有的話題性（topicality）」的分析解釋：¹¹

向上，因為如下文所論述的，相關婚姻、愛情與性等問題，在五四時代其實也是精英知識份子的關切所在。

5 *EL*, pp. 102-03.

6 *EL*, p. 100.

7 書中細部討論了與此有關的幾篇文獻：*EL*, pp. 104-22.

8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1976), trans. Robert Hurley (197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9 *EL*, pp. 7, 275-77.

10 *EL*, pp. 7-8.

11 *EL*, p. 127.

在 1910 與 20 年代的現代中國文化，女子同性情慾的能見度提高，或者該說是論述生產增加，所反映的是中國婦女改變中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地位——尤其是中上階層婦女的進入工資市場、婦女在公共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參與、以及婦女相對於父權家庭的經濟獨立。女子同性關係的社會重要性，不管被認為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是與婦女已然增多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力量一併加大的。以一種對應於西方「性相 (sexuality) [機制]」興起的方式（至少根據傅柯的說法），在追求現代化的中國，性相系統的運用——這系統將身體感官、感情依靠、以及個人特徵的類型與強度加以分類評量——變成了作為社會控制的親屬關係——即聯姻系統 (system of alliance)——的有力補充。¹²

也就是說，女子同性情慾所產生的「話題性」，其實是源自於晚清以來女性解放運動風潮所造成的男性焦慮，而這種面對舊有聯姻系統／父權體制鬆動的焦慮，方使得當時的男性知識份子擁抱西方的性學概念，好填補秩序崩解的空缺。

桑著的這個中心解釋，縱使鋪陳有限，卻自有它的洞見；譬如因此指出：「在五四時期，在中國都會的中上階級之間，打著現代化旗幟的、追求異性與婚前浪漫關係的自由化〔即所謂的『自由戀愛』〕，卻也是慾望的規訓化 (regimentation of desire)。異性浪漫愛情的正常化，其實部分是透過貶抑 (abjection) 同性愛來加以達成的」，¹³ 就是很有見地的說法。不過，儘管西方傳入的性相機制，在當時是有可能發揮了上述替代舊體系的「工具性」功能，但我卻不認為這就是這套機制之所以被刻意引進現代中國、並逐步造成相關概念典範轉移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桑著直到書末的「後記」才約略觸及，只是她在質疑傅柯對於性相機制出現的緣由語焉不詳之後，將之歸因於資本主義發展（套用同志研究學者 John D'Emilio 的

12 *EL*, p. 7. 類似的解釋，另見 *EL*, pp. 16, 23-24, 102, 228.

13 *EL*, pp. 15-16.

著名說法)與西化衝動,則也過於簡化。¹⁴事實上,傅柯一連串主要著作從不同角度觸及的,顯然是一個巨大變化(毋寧也還是所謂的「現代性」)的諸多面向,這樣龐大複雜的構成(一如資本主義),要勾勒它的內在邏輯與全幅面貌已屬不易,又哪能明白解釋它何以會發生?

然而現代中國刻意引進西方性相機制的緣由,卻顯然沒有這麼龐雜難解,傅柯的相關分析也仍有運用的空間。我指的是他在《性相史·第一冊》中提到的,優生學乃係現代性相機制一部分的說法——另一部分則是「製造」出同性戀等種種變態的相關醫學——而這個整體機制的關切,無非是作為現代國家首要資產的人口之有效維護與掌控。¹⁵而清末民初的中國,面臨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頭而展開現代化歷程,自然會對背後有著這樣議程的性學感到高度的興趣。有專著研究中國現代「性」的馮克(Frank Dikötter)就指出:「然而在一個高度民族主義與快速國家建立的年代,對於性的興趣所反映的,應該不只是想要沉溺於性以及商業利用。有識之士確信,性慾的正確控制是恢復國力以及達致現代化的關鍵……而醫學則被認為可以為性控制提供理性的指引。」¹⁶在現代中國譯述性學最有成績的潘光旦,對優生學也很早就持續加以研究關注,就是很好的說明。¹⁷

14 *EL*, pp. 276-77. John D'Emilio, "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1983), *Making Trouble: Essays on Gay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3-16.

15 Foucault, pp. 117-19; 不過傅柯的整個說法,要在全書的「第五部分:死的權利與生的控制」(Foucault, pp. 133-59)中,才會完整地串聯起來。

16 Frank Dikö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London: Hurst, 1995), pp. 1-2. 事實上,關於現代中國的這個思考脈絡,桑著也有論及(尤其是在討論相關最受爭議的人物、「性博士」張競生時;見 *EL*, pp. 16, 114-15),只是這在書中的重要性,似乎總不及前述所言的性別機制。譬如在前面那處討論(即「導論」)中,桑著在提及當時知識份子的種族優生關切之後,就以「更重要的是(More important)」這個轉接語,來引入前述關於男性焦慮的說法。

17 潘光旦在性學方面的譯述成績,見 *EL*, p. 120; 在優生學方面的著作則有:《優生概論》、《優生與抗戰》、《優生原理》等——讓我注意到這點的是 Dikötter, p. 185n14。

二、曲折的完成

這個「現代性計畫」(the project of modernity/modern sexuality：一如本文開始時的一語雙關)在現代中國啓動之後的效應，正如桑著所說，既開啓了「女子同性慾望」前此在古典中國所沒有的表達空間(與「男色」相較確實是沉默許多)，¹⁸ 同時卻也將它病態化與污名化了；這其實也符合傅柯關於製造「同性戀」的言說權力，反而使「同性戀」的逆反言說(reverse discourse)得以藉之發聲的說法。¹⁹ 縱使這個新的典範，如桑著所說，在現代中國的擴散看似十分緩慢，而且其對於舊典範的替代或許並非完全(而是產生某種混雜〔hybrid〕的狀態)，以致終其整個民國時期，仍不見同性戀被普遍標以強烈的病態污名，²⁰ 但是這個典範轉移的過程及其效應，恐怕已經在現代中國開啓而無法逆轉。桑著在分析郁達夫妖魔化女同性愛的中篇《她是一個弱女子》(1932)時，就指出：

在 1930 年代，當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活動升高時，蓬勃滋長的中國民族主義以及左派人士對於文學參與社會的強烈鼓吹，有可能使得女女浪漫戀情(還有異性戀愛)遭到白眼，因為對於當前的危機而言，這些主題無疑是自我沉溺而且毫不相干的，也因此，不是適合作家寫作的題目，除非是為了加以譴責。的確……在 1930 年代早期以後，小說家寫及同性愛的例子就比五四時期少了許多。也非常有可能的是，Krafft- Ebing 和 Ellis 這一系帶有歧視的性學，在 1930 年代，經由有關性衛生與性心理的通俗手冊不斷地翻譯引用，已持續累積了權威，因此很少有小說家會再視同性愛為一種正面的個人事務。²¹

儘管桑著緊接著指出當時的整體圖像遠較此複雜(即禁忌仍未完全成形)，

18 *EL*, p. 17, 42.

19 Foucault, p. 101.

20 *EL*, pp. 105, 158. 污名化的例子，最顯著的來自性學傾向最強的張競生(*EL*, pp. 114-15)，應該不令人感到意外。

21 *EL*, p. 156.

但在我看來，這其實已經預示了「同性戀」在內戰／分裂的中國／台灣接下來的命運：危機時代的國家權力膨脹總意味著個人性領域的箝制監控，具有優生傾向的性學則提供了國家控制的張本。

然而桑著在此後所呈現的中台兩地發展狀態，卻有些簡化失焦。桑著（第六章）概略地敘述了解放後中國到文革時期政治掛帥的去性噤聲、以及八〇年代逐漸開放以來的變化和出版，同時也非常盡心地探訪了近期出現的女同志集結；²² 而在台灣方面，則是以專章（第九章）描繪了（女）同志當前的社會處境、女同志與女性運動的分家、以及「同性戀的大眾媒體化與商業化」等狀況。²³ 但是就全書的歷史敘事而言，前半中國現代「性」計畫的發展線索卻顯得滯漫不清，桑著也未能繼續發揮前述標舉的性別分析，十分可惜：因為中國大陸近期的女同志書寫，多少仍是妾身未明地（被在地批評家）包裹在「女性意識」乃至「女性情誼」的框架中；²⁴ 而台灣女同志與女性主義者的姊妹鬩牆，原本即為桑著關注的對象。²⁵ 兩者顯然都是性別與性相互動交鋒的重要現象，但或許正是因為距離太近了，反而未能以前半的鉅觀視野來加以分析。不過為了接續前述中國現代「性」計畫的重要追索而儘量加以整理的話，則桑著一方面認為這個計畫在解放後的「新中國」形同中斷，因為整個毛澤東主政時期，同性戀這個話題是幾近完全銷聲匿跡的，而重新出現之時，則已是改革開放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軌的八〇年代了；至於國民黨接收退居的台灣，則被認為大體繼承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相關發展，加以強烈的美國文化影響，終致在九〇年代發展出美式風格的同志運動乃至酷兒論述。但這樣的說法則是明顯過於簡化。

的確，解放後的中國（尤其是 1950 年代之後），根據現在一般的描述，

22 *EL*, pp. 163-73.

23 *EL*, pp. 225-54.

24 桑著自己便有提及：*EL*, pp. 173, 186, 195, 321n31, 326n42。另參見虹影，〈大陸女作家女性之愛：寫在《鏡與水》之前〉，虹影編，《鏡與水：大陸女作家女性之愛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頁 3-17。

25 這個說法來自張娟芬，只是她比較正面地視之為「姊妹『戲』牆」。見張娟芬，《姊妹「戲」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其整體氛圍是高度禁慾的，性學（性科學）的研究也因為意識型態的關係而從學院中徹底消失，²⁶ 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認為，民國以來開啓的、前述「性」的醫學化歷程，就因此而遭到中斷或暫停（如果這意味著被其他形構所取代，或回歸更早之前的傳統狀態）。事實上，共產主義的強烈科學主義（scientism）傾向，以及共產政權全面的國家控制，都只會使得前述的性相機制，在中國解放之後更徹底地朝原先設定的方向進行。²⁷ 所以儘管在八〇年代以前同性戀可以說是完全消失於論述場域之中，但正如桑著也引述到的海瑞雅特·艾文斯（Harriet Evans）所說：「然而安靜並不代表對於同性戀沒意見……如同比較近期的討論顯示的，官方的安靜所掩飾的，其實是對於同性戀的一個廣泛觀點，認為它破壞了自然的異性戀秩序，是一種因為病態或心理異常所造成的性變態。」²⁸ 也就是說，解放後的中國，其實是接收了至少到解放為止的性學研究成果與價值觀，只是既未繼續吸收西方性學的更新發展，也未有機會如西方性學一樣，因為受到社會結構變化以及同志運動興起的挑戰而修正學科內建的「正常vs.不正常」價值判斷。而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在八〇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所重新出現的性相方面的著作，一方面勉強能夠連接上西方相關研究的最新發展，在另一方面卻又總令我們覺得充滿過時偏見的原因，這種並不一致的錯置感，大概就是我們今日與昔日初發展時的性學真正遭遇時所會有的感受吧。

至於台灣，在國民黨退守之後相當時間內的高壓統治與軍事緊張，所營造出來對於性的氛圍其實也是非常壓抑的，但由於美國（文化）的影響十分強大，對於性的談論也並未禁絕，所以相關性學的發展應該是有「持

26 劉達臨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 30 年中，是沒有性科學的立足之地的。1952 年，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相繼在大學教學中取消，不久以後又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帽子，更不用說什麼性科學了」。《中國歷代房內考》（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8），頁 793（中卷）。

27 有關性學作為一種科學，對中國解放後的持續影響，見 Harriet Evans,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28 Evans, p. 206.

續」的發展——我把「持續」二字放在引號之中，那是因為考慮到台灣醫學方面的強烈日本影響，因此其所承繼的具體狀態，恐怕並非單純的是民國時期的發展。²⁹ 只是這個「持續發展」，由於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也有類似國家機器力量高度膨脹、而民間社會相對萎縮的狀態，所以自然也不是亦步亦趨地追隨西方發展的腳步。因此在解嚴以前，台灣的性相狀態似乎是呈現一種「有性學論述、但無（同性戀等）逆反言說」的不平衡情況，因此性學的發展雖然大體是有與時俱進，但由於缺乏異議性相（譬如同志）文化的挑戰，其學科的偏見還是未見消除。這要等到八〇年代末解嚴之後，（由於經濟蓬勃發展所蘊含的）社會力驟然爆發，而有關性別／性相議題的風潮興起，於是才可以快速地銜接上歐美相關論述（即同志研究與酷兒論述）的最新發展。³⁰

總而言之，桑著所起頭追索的中國「現代性計畫」，在民國時期結束之後，其實是分別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以不同程度的曲折，很早便完成了以「同性戀」取代舊概念的典範轉移（儘管這個取代未必沒有其混雜的成分）。所以雖然具體的情境並不相同，但兩地同在世紀末所先後面對的，其實是與世紀初大不相同的、已遭國家社會高度污名化的「同性戀者」的現身發聲。

三、華文女同志系譜學

以上對於桑著歷史大敘事的檢視商榷，就全書的結構份量而言，可能有些偏頗，因為桑著的主要內容與最大貢獻，其實是對於華文女同志文化

29 日本方面的發展，可以參考 Gregory M. Pflugfelder, *Cartographies of Desire: 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 1600-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尤其是第五章與第六章，只是台灣作為一個殖民地的情況是否有所差異，還有待相關的研究。不過中國現代「性」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受到日本的強烈影響（前已提及，見 *EL*, pp. 102-03, 112-13），所以可能也並無過分強調此間差異的必要。

30 一個相關的歷史分析，見朱偉誠，〈同志·台灣：性公民、國族建構或公民社會〉，《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2003年5月）：115-51（頁116-30）。

與文本至今最完整的系譜整理，也是第一本專著（前此多半只是以男同志為主的專著中的一小部分，甚或附錄），只是桑著並未滿足於類似綜論性開山之作的常態，即是僅將相關資料加以臚列排比，而是更具企圖心地提出了一個論證性極強的、關於中國現代「性」的中心論旨，非常值得相關研究者注意與對話討論。然而桑著在結構上的主體，其實是（同志）文學研究慣用的文本分析，在全書涵蓋的四個時期／地區（「前現代中國」、「民國時期」、「毛澤東以後的中國」、「解嚴後的台灣」），各選擇重要的文本來進行細部閱讀，以建構出對於當代華文女同志主體有意義的系譜傳承。恐怕得要如此理解，才不會覺得本書在結構上的有些安排令人困惑；譬如「第一部分：前現代中國」之中，在為前述「中國現代性」的中心題旨交代必要的、古典中國女女情慾狀態的背景脈絡之後，還另闢專章解析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五中的〈封三娘〉一篇，就並非歧出，而是為了建構華文女同志系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桑著之所以大張旗鼓地細部閱讀這樣一位看似不脫男性中心主義作家的這樣一篇作品，³¹ 其目的顯然是以「異議閱讀（dissident reading）」的操作，在多半有問題的古典傳統中，就少數具有女同潛能的文本，努力開拓它女同志主體的意義空間，其成果值得稍加檢視。³²

初讀之下，〈封三娘〉一篇的女同意義果然是憂喜參半的：封三娘與范十一娘兩個美女彼此相遇、進而互相「愛悅」，固然是十分明白清楚的事，但是故事後半，封三娘主動為十一娘尋覓「佳耦」（孟安仁），³³ 積

31 根據桑著，蒲松齡《聊齋志異》中描寫兩女相悅的那些作品，有些符合「烏托邦多婚制的明清文學幻想」：那就是彼此相愛的兩女共事一夫，使得原本把男人排斥在外的女同情慾反成了男人多妻樂園中的「社會潤滑劑」；有些則直斥為危險且無出路（EL, pp. 49-50, 67）。

32 所謂「異議閱讀」，指的是「明目張膽地重構權威文本，使它被迫逆勢地產生顯然是反對式的種種解讀」。Alan Sinfield, *Faultlines: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ident Read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22. 一個類似的、有關華文男同志系譜的操作，見朱偉誠，〈詭異的鏡像：透過馬婁的《愛德華二世》來看中國古典男色的「君臣篇」〉，何春蕤編，《同志研究》（台北：巨流出版社，2001），頁 239-78。

33 此處及以下所引文，根據張友鶴輯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上

極安排兩人成婚，然後十一娘爲了使三人能夠同在一起，希望三娘也下嫁孟，她不從，便設計使孟加以侵犯以造成既成事實，三娘這才告知自己乃係狐（仙？），然後離去——不禁令人好奇，這樣的一篇作品，桑著將如何以女同志主體的觀點來加以逆勢閱讀？我以爲桑著在此展現（也就是示範）了一種閱讀的細膩巧思，頗值得觀摩學習。而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對於〈封三娘〉這個文本中的若干谿翹，提出了相當具有啓發性的解釋，茲摘要整理如下：（一）是故事中不斷提及的階級差距，爲封三娘與十一娘相交時始終耿耿於懷、且不欲爲人所見的原因，然而十一娘本人與家人對於三娘的出身其實皆不以爲意，卻對孟安仁的的家貧非常不能接受，這固然是古時婚配與交友考量不同下的自然結果，但不也說明了三娘自身的介意，正反映了她心中認爲自己與十一娘的相交，實可「比擬於（事實上甚至強過於）跨性婚姻」，而她所不欲爲人所見的，正類似於一種同性戀的「衣櫃狀態」？³⁴（二）是封三娘主動爲自己的「愛人」十一娘安排婚姻，這點桑著認爲固然有可能是蒲松齡在文本上「爲了排除女同性情色接觸『威脅』的機制」，但若挪用著名同志研究學者賽菊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認爲兩男共愛一女的三角關係實爲達成男同性社交（homosocial）的經典說法，則也有可能「加強了女同性社交情誼並且透過媒介達成愛戀」，也就是說，孟安仁可以被讀爲兩人情愛交歡的替代媒介（雖然這個媒介也有反客爲主的危險）；³⁵（三）是封三娘拒絕與十一娘共事一夫的原因：她先是說自己在練養生術，爲「長生，故不願嫁耳」，等到被強暴之後又懊惱地說：「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桑著則質疑這既不符合道教對於

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610-17（冊一）。

34 *EL*, pp. 74-78.

35 *EL*, p. 81. Eve Kosofsky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27. 這是個以女同志爲觀點的重要理論挪用，不過我覺得封三娘之所以如此積極地爲范十一娘安排良緣，或許可以從她說服十一娘的一句話中見出端倪：「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會不會是三娘爲了怕自己與十一娘的「孽緣」越陷越深而遂出此策呢？因爲三娘最後告別時對十一娘說：「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也就是說，三娘爲十一娘積極安排婚事的動作，正證明了她對十一娘迷戀之深。

性的態度（其房中術認為男精對女人有益），又不符合明清文學想像中，狐仙總是積極與男子性交、以獲得陽氣幫助自己修練的通則，所以只能說封三娘的種種不合常規的「古怪(strangeness)」，或許也正是「怪胎(queer)」之怪，而証之以這類偏愛同性的所謂「怪女子(odd girls)」在蒲松齡的筆下，也總是以非人的形象出現。³⁶

桑著在此運用了好一些非傳統的批判觀點（包括西方同志研究的理論成果）來細讀《聊齋》中並不常被論及的〈封三娘〉一篇，是因為面對這樣顯然具有潛在女同意義、卻又深陷於古典知識體系中的文本，要想從中讀出能夠為當代女同志主體性所用的意含，非如此不循常軌（就好像封三娘一樣）實不足以為功。³⁷好在桑著處理的另外三個時期，已然進入現代「性」的階段，促使女同志乍現的相關知識體系脈絡已然到位（縱使完成程度有異），因此桑著的文本閱讀工作相對而言也就沒有那麼艱鉅了。所以我們看到桑著對於五四時期作家廬隱的代表作《海濱故人》與〈麗石的日記〉（俱發表於 1923）中女同性愛的意蘊，遠較為遊刃有餘的詮解，這一方面固然是來自於作者自傳的互文(intertextual)引證：根據桑著，廬隱的旅日遊記《東京小品》（1930-31）中，更明白地展現了廬隱自身對於女人／女體的慾望乃至易服扮裝的體驗；³⁸在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前述女同性愛在現代中國的「話題性」脈絡（當時即有批評家從精神分析的觀點明白指出她作品寫的是女同性愛），³⁹使得這個意義訊息從作者生產到讀者

36 *EL*, pp. 84-89, 68. 「怪女子(odd girls)」是桑著這章的標題：“Odd Girls in Pu Songling’s Tales of the Strange”，應該是取自重要的美國女同志專著：Lillian Faderman,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A History of Lesbian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37 當然這樣的閱讀不是沒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譬如桑著注意到封三娘與范十一娘相遇的地方在尼姑庵，便指出李漁的女同性戲劇《憐相伴》中兩位女主角的相遇點也在尼姑庵，顯然是觸碰到中國古典女同性傳統中一個重要的空間／宗教聯繫，只是桑著未及細探這個聯繫的涵義，卻將之類比為「全女性酒吧中的釣人活動」，則顯然是有些引喻失義（*EL*, pp. 73-74）。

38 *EL*, pp. 133-48.

39 桑著引述的是趙景深，《文學講話》（1927/30），（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1936），頁 21-22。

接收之間，已經相當可信地構成了一個可以互相辨認的迴路。

不過，面對看不見或壓根兒不想看見同志身影的既有批評建制的強大壓力，桑著所討論作品中身體情色接觸證據的往往付之闕如，在前述古典文本的分析中讓桑著大費周章迂迴論證的，⁴⁰ 在閱讀廬隱的文本時，也似乎還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擾。⁴¹ 但就算是在桑著接下來討論的、九〇年代中國大陸作家林白的〈迴廊之椅〉（1993）與《一個人的戰爭》（1994/96/97），以及陳染的《私人生活》（1996）等作品中，女同性情慾乃至身體接觸的描寫已經十分清楚了，這些呈現卻還是因為穿雜在一連串異性關係之中，而且最終以沒有對象的自戀（《一個人的戰爭》）或是男女不拘的「超性別意識（gender-transcendent consciousness）」（《私人生活》）為其安頓（還是開脫？）之意識型態，所以桑著也只好繼續戮力費心地拼湊這其中零落曲折的女同圖像（包括與作者進行訪談）。恐怕只有桑著最後選擇討論的，出現在世紀末台灣的邱妙津《鱷魚手記》（1994），才真正毋須詮解地驀然讓大家見識到女同志狂喜與絕望夾雜、詼諧與批判並存的憾人身影，那麼清楚地以華文現身在我們眼前。我所要說的是，桑著的文本閱讀耗費絕大的工夫在論證女同志情慾的確實存在（而少有力氣及於太多其他），那是因為其所面臨的時空情境正一如書名所說，是華文世界中女同志初來乍現的歷史性的一刻，而這本書自身豈不就是一個具有造就作用的語言行動（a performative speech act）？以它的研究書寫大聲召喚了、也參與搏成了華文女同志主體從過去到現在的系譜存有。

40 桑著對此「證據不足」的焦慮，見 *EL*, pp. 67, 78-81.

41 *EL*, pp. 134-37. 為此桑著引述了西方女同志歷史／文學傳統中極為重要的「浪漫友情（romantic friendship）」概念以為支撐，但似乎還是未能完全解決此處的焦慮，因為性到底存不存在於「浪漫友情」之中，始終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然而這卻並未阻止當代女同志普遍視之為自己系譜傳承的一部分，桑著在此似乎是有些過分自覺理虧而解釋太多了（i.e. too apologetic），其實不妨可以更理直氣壯一些。